

做戏

周华诚

钱，也是不容易。

越剧团里，演员都是女人，小生老生也是女人扮演的。大家都没有正儿八经上过戏剧学校，最多是几个月的培训班，跟着老师学一学。演员的年龄结构，将将过得去，都在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，再年轻的，就没有了。演戏真是要靠牺牲，直接找一个年轻人来，哪怕是学校里出来的，几个曲本她拿得起，但要说到没有曲谱的“路头戏”，那还真不行。到底，老演员到位一些。有的演员也肯练，台上演，台下也在苦练。也有演员做戏做倦了的，离开了姐妹们，出去开了棋牌店。做了棋牌店的老板娘后，空下来的时候，也怀念四处演戏的时光。喝了酒，一高兴起来，就在棋牌店里唱上一两段。

说话间，我瞥见一个年轻演员，衣服没换，妆也没卸，就坐在舞台边上划拉手机发消息。“是不是谈恋爱……”美花开着玩笑，对方抬起头来，只是笑笑，没有接话。她还沉浸在手机里没出来呢。这么一个剧团，最早只有十来个人，慢慢地，有了添设备，有人了加人手。后来汪团长投资，拉起这么一个剧团，也的确不容易。美花说到的汪团长，也是常山人，演员们的工资都是汪团长负责，四处奔波招揽生意，也是汪团长。汪团长这个活儿不好干，被人尊重也有，两面受气也有，一般人做不好。至少也要能喝酒吧——美花这样说，比如去找老板包几场戏，不喝酒，这合作是谈不下来的。我和美花聊着这么一些闲话，却对隐藏在幕后未曾谋面过的汪团长心生一股敬意与好感。美花又说，汪团长这个人，做的是园林景观的生意，但是他又把他在园林景观方面挣的钱，花在了做戏上，算是个戏班班主了。

我也奇怪，以前，只听说城里人送戏下乡，没有听说过乡下地方“送戏进城”的。说到这一点，美花就很自豪。她们这个戏班子，江西浙江到处跑，把戏做到各个地方去，大家都是很高兴的。再过三四天，这个班子做完，美花他们就要回常山去演出了。此时夜幕降临，做戏的人从后台钻出来，走到世俗的炊烟里去。她的姐妹们，大概已经把晚饭做好了。

原文很长，使用的典故和比喻很多，大概是因为对帝王说话，不得不小心翼翼。从省略的部分来看，意思传达明白无误，即（没做成皇帝的）皇子“为臣下所侮辱，有司吹毛求疵，答服其臣，使证其君，多自以侵冤”。《汉武帝》隐括这段话，说武帝登基不久，

有年夏天，随诸师友泛舟太湖，有位朋友忽然问，如果想就某方面展开研究，应该做些什么呢。老师答道，如果不急着写论文，先留些问题，如果久了，自然会深入，到时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。说完，老师顿了顿，笑着说，当然，要先留自己的留意。听到这句绕口令样的话，大家笑了起来。小船加速，犁出一道长长的水痕。

后来，我常常想起这个“留意”，其中最也最重要的，正是留意自己的那个留意。过此以往，便顺理成章。如已经开始了解某个领域或某些人、事，自然不经意就留意到这方面的研究和著作。我因去年写到汉武帝晚年的《轮台诏》，翻查了一些相关资料，待看到吉川幸次郎《汉武帝》译本出版，赶紧去买了本来看。

后人写较早之前的历史，尤其是那些声名极盛的人物，基本材料上几乎翻不出什么花样，只能在见解上揣摩用心。这本《汉武帝》，虽然据说作者长于考据，也算得上“汉学泰斗”，但并没有石破天惊的翻案文章，倒是其持论的平正，叙述的流畅，留给我非常好的印象。另外，大概是长期研习文学之故，吉川常能在文字的缝隙里，辨认出历史记载背后的人心和人生，颇引人深思。先节引《汉书·景十三王传》里的一段文字——

建元三年，代王登、长沙王发、中山王胜、济川王明来朝，天子置酒，胜闻乐声而泣。问其故，胜对曰：“今臣结日久，每闻幼眇之声，不知涕泣之横集也。臣闻社稷不灌，屋鼠不熏。何则？所托者然也。臣虽薄也，得蒙肺腑；位虽卑也，得为东藩，属又称臣。今群臣非有葭草（芦苇秆内壁的薄膜，指关系疏远的亲戚）之亲，鸿毛之重，群居会议，朋友相为，使夫宗室摈却，骨肉冰释。斯伯奇所以流离，比于所以横分也。《诗》云‘我心忧伤，怒焉如捣；假寐永叹，维忧用老；心之忧矣，疚如疾首’，臣之谓也。”

原文很长，使用的典故和比喻很多，大概是因为对帝王说话，不得不小心翼翼。从省略的部分来看，意思传达明白无误，即（没做成皇帝的）皇子“为臣下所侮辱，有司吹毛求疵，答服其臣，使证其君，多自以侵冤”。《汉武帝》隐括这段话，说武帝登基不久，

愿少留意

——吉川幸次郎的《汉武帝》

黄德海

“他的兄弟中的几位来朝。为此举办欢迎酒宴，音乐奏起，突然席中有一人抽泣出声”。武帝询问缘故，哭泣者言道：“尽受欺侮的自己，一听到悲哀的音乐，不禁落泪。我们（皇子）都是如此。”这个哭泣的人，就是上面写到的中山靖王刘胜，汉武帝的异母兄。不过问题来了，那些胆敢侮辱皇子的，到底是“群臣”还是某些臣子呢？

谈到这问题的时候，吉川先从汉代的公主入手：“一般来说，汉代的公主拥有非常权势。这些权势甚至在皇子之上。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这些皇子都会以地方王的身份，离开国都长安，因此，他们很少有干预中央政治的机会。”也就是说，出现这现象，并不表明汉代女性地位高（“她们没有继承帝位的可能”），而是皇子在国都容易扰乱社会秩序，因此常被赶离，所以公主才获得权势。不过，即便皇子们离开国都，去了自己的封地，仍然是不稳定因素，“一旦他们发动叛乱，中央将极度困扰，所以皇帝派遣监督的官员，以日本江户时代家老（原注：日本江户时代各藩藩主的首要家臣）式监察他们的名义，用锐利的眼光时刻监视他们”。

刘胜肯定夸大其词了，侮辱皇子的应该不是什么“群臣”，而是随诸侯到自己封地上去的监察官。这些监察官对皇子不只是侮辱，有时候还“会故意策划事件陷害地方王，以此作为自己的政绩”。我们约略能猜到这结果，因为人总是这样，即便前面无比危险，为了一时的政绩或利益，仍然会刻意去构陷。吉川更深一层的推测，就不大容易想到了：“武帝的兄弟诸王大多被描述成超乎想象的愚昧之人，这些记录似乎也是在前述状态下产生的。”蓄意构陷的监察官报送的材料既有问题，进入皇家档案馆后史书照录，当然会让皇子们显得

愚昧。这推测提示我们，读各类历史的时候，要时刻有警惕之心，即便出自中秘的文书，也未必全值得信赖。

《汉武帝》里没写的是，刘胜这一哭，让武帝“厚诸侯之礼，省有司所奏诸侯侯事，加亲亲之恩”，稍稍缓解了皇子与监察官的紧张关系。其后，武帝“更用主父偃谋，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，而汉为定制封号，辄别属汉郡”。此举虽显出皇帝对封地皇子的厚恩，诸侯却从此“地稍自分析弱小”，势力大大削弱。其实不止跟诸皇子，武帝晚年与太子刘据的紧张关系，恐怕也可以从这个方向去理解。吉川点出的这一情形，掀开了历史华丽帷幔的一角，让我们看到了重重宫闱里的某些深痛隐衷。这深隐之处，书中还有另外一段，涉及的是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——

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，天下和洽，而固当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法制度，定官名，兴礼乐，乃悉举其事宜法，色尚黄，数用五，为官名，悉更秦之法。孝文帝初即位，谦让未遑也。诸律令所更定，及列侯悉就国，其说皆自贾生发之。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。绌、灌、东阳侯、冯敬之属尽害之，乃短贾生曰：“洛阳之人，年少初学，专欲擅权，纷乱诸事。”于是天子后亦疏之，不用其议，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。

从这记载里看到的深痛，大概是贾谊的有志不获骋。既然“诸律令所更定，及列侯悉就国，其说皆自贾生发之”，贾谊当然应该“任公卿之位”。可在一干元老的干涉之下，文帝卒“不用其议”，真堪惋惜。数年之后，文帝再见贾谊，结果也竟是“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”，让人感慨万千。

我走到西溪北苑小区，远远听到锣鼓声，继而是一阵唧唧呀呀的戏腔，热闹极了。那戏台就搭在一片空地上，不远处是摩天大楼，幽蓝的玻璃幕墙直伸到云端。我没有想到，在这样的地方还会有戏班子。更没有想到，看戏的居然那么多。干把人吧，我估摸着数了数，干把人还不止——银发长者居多，坐在轮椅上的好几个；中年人也不少。还有一个送快递的小哥，把三轮车停在人群之外，他就坐在三轮车上看戏，仿佛入了迷。

戏班子叫百灵越剧团，管戏班子的女人叫美花。这天他们做的戏是《大闹开封府》，上午刚演了一场《游四门》，都是老戏，老戏特别受欢迎。美花在后台，一会儿跑去拿道具，一会儿操控电脑，调个灯光。台下观众的心都跟着剧情走，剧情里的薄情男人一亮相，下面就哄一声闹起来，咕咕咕，翻脸不认人了！看到包公黑着脸走出来，就说，这下好了，这下好了。

后台穿戴齐整妆容精致的演员，加上前台正演出的几位，一共有十几人，前后台，来回穿梭；再加上坐在舞台右侧的钢琴班，以及十来套个装满服装道具的铁皮箱——后台就满满当当，局促极了。在这局促当中，却还有一个摇篮，摇篮里睡了一个满岁的小宝。小宝娘在前台扮老旦，小宝爹在吹打班，拉得一手好扬琴。这咚咚锵锵、噼噼啪啪的鼓乐声里，娃儿睡得真香。还有一个女孩儿大概三四岁，是跟着戏班做工的爷爷到处跑，这会儿在后台抱着别的演员的腿，学着戏里的人披头巾。女演员还在候着场子，这会儿削好一个苹果，切下一片分给女孩儿吃。

我和美花就在这咚咚锵锵、噼噼啪啪的鼓乐声中聊天。戏班子是常山县的，美花是建德人。以前在学校读书时，喜欢上了越剧，并没有想到以后会拉扯着一个剧团四处跑。你别看一个戏班子，事情可真多。第一是担心有没有生意。戏有得做，钱有得挣，大家都是开心的。如果戏接得少，做得青黄不接，便心里愁闷。转场比较麻烦一些。搭台子的钢管、篷子，舞台的音响、灯光，那么多的戏服衣帽箱，还有要装满十四只铁皮箱的大屏幕，这林林总总的家什，去远一些的地方演出，要雇九米六的大车才能运走。去近边的村庄，就雇拖拉机，需要三台拖拉机才运得完。还有这么多演员——大家拼车，开上四五台的私家车，油费过路费，说好了大家平分。这样大动干戈，都希望到了一个地方，就能停下来多演几场，先把路费挣出来，再把辛苦费挣出来。

小生，老生，小旦，花旦，老旦，小丑，一个戏班子里，这些角儿都要配齐。戴胡子的老生要两三个，小姐丫鬟三四个，跑龙套四五个。要不然你把戏单递给人家——戏单上可是有两百多个戏哪，人家一点，你就暗暗叫苦：角儿不够用呀，那戏怎么演。美花自己也上台，吃这口饭，还是要听观众喝一声彩。观众说“这场戏做得好”，美花她们，就觉得多大的辛苦也值了，眼神里闪闪发光。

下午三点四十分，一阵鼓乐过后，这场戏就结束了，舞台底下乒乓乓乓椅子响，大家都散去。演员们念叨着“下班下班”，从前台绕到帷幕背后来，卸妆的卸妆，换衣服的换衣服，有人上衣都湿了。也有人妆都没卸，上衣没换，就骑上电瓶车去远了，也不知道是去哪里。一时间，人走了，后台寂寞得很。美花说，下了班大家就自由喽，打牌的打牌，睡觉的睡觉，也有人负责做戏。演员们到得一处地方，先寻个大礼堂什么的宽敞地方，把帐篷扎下来。每天一早，美花自己上菜场买菜。现在菜价贵，肉价更贵，二三百元，买不了啥菜。做饭也是演员自己来，这样就俭省一些。这么一个团的人，二三十张嘴，每天工资要五千六七，每天睁眼就要

2020年11月2日



笔会

大秦腔

(油画)

张元稼

谈谈徐志摩配眼镜

王从仁

名，这仅仅是想当然耳。

先看看泥城桥的问题，泥城桥其实是在上海，目前，这座桥的正式名字叫“西藏路桥”，在上海的闹市区西藏中路上，横跨苏州河。因此有人以为，徐志摩当年走的是这座桥，也就是走在西藏中路上，走上西藏路桥，即泥城桥，跨过了苏州河，那也就是错解。当年，徐志摩不是走在如今的西藏中路上，因为那时的西藏中路还是一条河，叫做“泥城浜”，徐志摩是走在南京路上，走上泥城桥，跨过了泥城浜。

那么，上海人为什么把西藏路桥称为泥城桥呢？说来话长。

泥城桥因泥城浜而得名。泥城浜原是条“护界渠”性质的内河，由英租界开挖，始建于清咸丰三年（1853），到1863年完工，成为连接洋泾浜（即今延安路）和苏州河的“泥城浜”。1863年10月起，公共租界工部局着手在泥城浜进行丈量与设计，先后建起四座桥，因横跨泥城浜而都被称为“泥城桥”：北泥城桥（位于今西藏中路苏州河南境）、中泥城桥（大致在今凤阳路西藏中路口）、泥城桥（大致在今南京东路西藏中路口）、南泥城桥（大致在今广东路西藏中路

口）。南京路上的一座就叫“泥城桥”，徐志摩当时走的，应该是这座桥。（参见马学强《上海城市之心》第二章《从边缘到中心》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2017年10月出版）

1912年泥城浜被填没，当年泥城浜东侧沿河浜有条小路叫西藏路，河道填没后，成了大道，就是现在的西藏中路。20世纪20年代，建造了新的泥城桥，成为上海南北主干道西藏路上横跨苏州河的一座桥梁，正式的名字叫“西藏路桥”，但上海人由于历史上的泥城桥名气响亮，习惯仍然叫“泥城桥”。

徐志摩第一次配眼镜理应在上海的另一个原因是，当时的硖石甚至海宁都没有眼镜店，即使上海的眼镜店也不多。20世纪初，英国人约翰·高德（John Goddard）在上海开设了“高德洋行”，专营机磨验光眼镜，据称是上海首家西式眼镜店。后来其他洋人也效仿此举，如托拔丝（Tobias）开设了“明晶洋行”，英籍犹太人雷茂顿（Riarton）开设了“雷茂顿洋行”。1911年曾在高德洋行工作过的中国员工筹资开设了“中国精益眼镜公司”，才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的机磨验光眼镜店。

但据笔者查找，1903年8月27日的《新闻报》第七版，有明晶洋行配眼镜的广告，这是目前能查到的上海报刊上最早的眼镜广告。简言之，1908年的徐志摩要配眼镜，只能到上

海，在那几家洋行配。

据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上海指南》记载，当时上海也只有13家眼镜店，著名的如精益求精、高、高德、明晶等9家全都集中在南京路。因此当年徐志摩应该是在南京路配了眼镜，沿着南京路往西走，走上了泥城桥戴上新配的眼镜，喜出望外。

当时徐志摩才十三岁，一个孩子跑到上海配眼镜，似乎不太可能，应该是父亲徐申如带他去的。志摩的父亲徐申如也是近视眼，早早地配了眼镜，随着机磨验光眼镜的出现，趋时务的徐申如替儿子配一副机磨验光眼镜，是极其自然的事。加上徐申如屡次到上海，对上海十分熟悉，所以帮志摩配眼镜也是轻车熟道。

徐申如第一次到上海坐的是轮船，1882年，上海招商局“驛利号”开辟了申杭客运专线，两年后，即1884年的暑假，徐申如随父亲一同坐“驛利号”前往上海，这一年，徐申如十三岁。（见刘培良《徐申如：诗人徐志摩之父》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0月版，第23页）

以后，徐申如兴办新型产业，结交各方名流，加上硖石到上海的铁路开通，他到上海更是熟门熟路，就在徐志摩配眼镜前不久，徐申如流连上海多日。

据《郑孝胥日记》记载，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（1907年12月）初八日

（12月12日）：“午刻，汤翁先邀狄九华楼，座间晤缪小山、徐申如。”按先是汤寿潜的字，汤寿潜是位风云人物，当时与郑孝胥、张謇等组织预备公立公会，担任副会长。缪小山（亦作筱圃），即曾为张之洞幕友的缪荃孙，海内知名的藏书家、目录学家。

晚清上海的九华楼有两个，一家是著名的徽菜馆，在清末民初的上海风头一时，是上海徽菜馆的大牌。另据晚清朱文炳《海上竹枝词》云：“扬州馆子九华楼，楼上房间各自由。只有锅巴汤最好，侵晨饺面也兼优。”这个“九华楼”则为扬州馆子。他们到底在哪一家“九华楼”聚餐，难以确考，可能性比较大的，是在徽菜馆。

两天后，郑孝胥日记又说：“午后，诣日辉（晖）港，与蒋抑之、沈新三、徐申如、刘厚生、熊棠村共观呢厂工程。”晚上，徐申如还和郑孝胥等一起吃花酒。（以上均见《郑孝胥日记》，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第1版）

所以，徐志摩的眼镜是父亲陪同下在上海配的，当无问题，这大概也是徐志摩第一次到上海。只是徐申如没有继续陪儿子玩，却让志摩的“一个朋友”陪着走走路，可见徐父对儿子并非娇生惯养，志摩也是个独立性很强的孩子。凑巧的是，徐申如和徐志摩第一次到上海的时间，都是虚岁十三，想想这一对都属猴子的父子，真是“猴子称大王”。

三年后，郁达夫和徐志摩成为同班同学，达夫称志摩是：“戴着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”，这副眼镜对郁达夫印象太深刻了，想当然，这是徐志摩的原配眼镜，于是我们知道了，“神眼闪烁”的那晚，志摩配的是“金边眼镜”。

从此，“金边近视眼镜”成了徐志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徐志摩形象的“标配”。

